

[编者按]2014年4月,本刊在盐城师范学院举办了“外语研究应用价值高层论坛”,对外语研究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讨。在此发表李建波关于外语研究应用价值的一种思考。此文从外国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的关联性入手,提出了外语研究应用价值的一条实现路径;在我国智库性质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背景下,探讨外语研究对于情报分析研究与情报分析人才培养的作用,似亦有其现实意义。

外国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

李建波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

摘 要:文学批评探究文本深层的意义,与情报分析在理论、内容和方法上有所重合。外国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所在国人文意义,揭示外国文化本质和人的行为模式细腻、具象、生动、富于情感进展逻辑刻画,有助于弥补情报分析的关注空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也可以成为情报分析理论方法的重要补充。而在外国文学批评研究和教学中借鉴情报分析的方法和关注点,则有利于拓展外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疆域;对于增强学生批判性阅读能力,培养智库型人才 and 巩固国家文化安全均有裨益。

关键词:外国文学批评;情报分析;应用价值;人文关注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5)03-0001-06

0. 引言

Habib 在他的《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2005)的导论里开宗明义:“在我们的世界里,学会批判性(critically)阅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2001年的‘9.11’事件及其后续形势对此种学习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也表明误读和教育的欠缺是多么地危险。”(Habib:1)他进而指出:“就整体而言,人文研究已不再是奢侈品(luxury),而是必需品(necessity),对于我们文明本身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vital)。”(ibid.)一部旨在描述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以此种警世危言开篇,难免会循着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范式——“将文学的审美性从道德、宗教等关注中孤立出来”(ibid.:562)——一路走来的文学批评实践者瞠目。文学批评似乎更加重视其应用价值了。从上述的观点来看,Habib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发挥其增强读者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功能,为挽救我们的文明做出贡献。当然,Habib的论述是在“9.11”的语境下做出的,他的着重点是放在跨文化问题上的。不独Habib对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重要意义如此强调,在他之前,Gates, Jr. 对此的强调更为极端:“世界多种多样文化间实现相互了解的挑战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惟一的、最重要的任务”(Gates, Jr. 1992: xii)。

Habib认为,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要了解作者为什么要写某一文本,为谁而写,有何种宗教、教化

或政治的目的动机,其历史和文化语境为何。当然,我们也可继而探究其文体、语言、结构以及其中的修辞和文学技巧运用。”(Habib:1-2)实质上,这也是Habib给文学批评下的定义。从这个定义来看,文学批评与情报——尤其是开源(open source)情报——分析是何等相似。然而,对于这两种实践的相似性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去探究。

1. 文学批评与情报研究的隔阂及两者融合研究的意义

文学批评与情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批评与情报研究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情报观念将情报界以外的研究者拒之门外。迈克尔·瓦尔纳(Michael Warner)曾是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的历史专家,他从传统的情报概念出发解释过情报研究封闭的原因:“情报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为阻止、影响或者了解可能会对其造成危害的其他国家(或不同的敌人)所做的秘密工作。”情报工作的解密或泄密可能会导致“易受伤害的情报来源和情报手段的损失——自不必说,部队、线人甚至领导人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情报工作者总是把情报当作敏感机密,”情报机构对泄密者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Warner 2007: 17)但是在美国,学术界介入情报研究的程度却因两种因素而大为改观。一是对美国情

报“丑闻”的调查使得美国情报界的运作浮出水面,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是美国的情报概念范畴进一步扩大,涵盖了一些不十分敏感的领域。从被称为美国“情报之年”的1979年到“9.11”之后,美国的地方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情报问题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形成了美国情报研究的开放性特征(Writz 2007: 29-31)。美国情报界对学术界的加盟持鼓励态度。联合军事情报学院^①公开出版的每份成果的扉页都印有如下声明:“联合军事情报学院支持并鼓励总结教训、增强对政策制订和行动部门支持力度的情报问题研究”,其支持和鼓励的对象具有开放性;成果涉及领域也相当广泛,杰弗里·怀特(Jeffrey White)的《莎士比亚对于情报分析者的意义:文学与情报》(*Shakespeare for Analysts: Literature and Intelligence*, 2003)便是其中的一项成果。

在我国,文学批评与情报研究之间仍存鸿沟。其原因之一是对情报的概念认知条块分割,较缺乏全面性。这个问题在地方高校的相关专业较为凸显。沈固朝教授在2009年曾专就这一问题著文进行评析。他认为地方高校的情报学发端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在指情报时往往用的是相等于国外的 *information science* 的概念。由此沈固朝委婉地指出了我国地方大学相关专业对于情报概念的认知偏差:“用不太恰当的话来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情报学’名义下所进行的研究和教学,其对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不属于情报学,而属于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沈固朝 2009:25)与此同时,相关学者将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情报称作“他们的情报”(同上:24),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类似于‘谍报’的信息,带有秘密的色彩”(同上:25)。显然,这种情报概念与上文中瓦尔纳所列举的传统情报观相同。传统情报概念的局限性阻碍了地方学术界对情报问题开展研究;同样,情报概念的条块性和封闭性也使情报与文学的融合研究难以开展。

二是我国情报研究教育相对普及不足。王云峰、沈固朝(2012)以国际情报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lligence Education,简称IAFIE)成员为例,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军地院校等融合开展情报研究教育的情况:“与常规教育协会不同之处在于,IAFIE的研究机构会员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或者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这样的高等院校,也有情报机构的身影,如美国军事大学(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或国防情报学院(National Defense Intelligence College)。在企业会员中,也出现

了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军工企业。”(王云峰,沈固朝 2012:44)美国情报研究教育的普及在“9.11”前的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热潮。Godson(1986)陈述了这段历程:美国国家战略信息中心(National Strategic Information Center)于1979年建立了大学情报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用以推动大学及研究机构开展情报教学与研究。该联盟经常召开由大学教师参加的研讨会,开列书单、编写课程指南等。到1986年,大学里开设的情报课程从数门增加到了上百门(Godson 1986:1)。而且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以“增强国民对国家安全要素的理解”(ibid.)为名。

其三,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在两股力量的联合作用下,一定程度地出现了忽视研究的应用价值倾向。第一股力量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形式主义导向,从结构主义将所指的概念化到后结构主义能指“defer to”其他能指的概念,将文学批评实践一步步带离了现实问题。另一股力量便是高校和学术研究界的重量轻质的量化评价。这种评价体系使得论文或成果的数量渐变为职称评定、学科评估、评优评奖的惟一标准。在数量要求的重压下,外国文学批评界一度出现了走捷径的现象,即研究的是外国人提出的问题,得出的是外国人得出的结论,创新点大概在于研究对象(文本)的不同。再加上对外国的文学批评范式的认识存在管中窥豹问题,忽略了在国外也相对盛行的应用研究,对于将外国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相融合研究更缺少关注。而在美国,诸如《“9.11”与小说》(*September 11 and the Novel*, 2009)之类文学批评与情报联结紧密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

美国情报研究的相对广泛参与性与情报教育的相对普及性似有可借鉴之处:一是情报工作主要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和依据,而情报分析又是情报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复杂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情报所涉及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积极调动一切可能的见解资源来寻求答案的难题。”(White 2003:1)情报问题需要全视角研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视角都是情报研究——尤其是战略情报研究——的重要视角。文学批评的视角可谓集大成,涉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当然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视角;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具备其他文类所相对缺乏的丰富的人文关怀。文学批评的独到之处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破解情报难题的有益补充。二是由于情报工作的服务对象是聪明绝顶的决策者,这就要求情报分析人员具备某些方面过人

的素质和能力水平。相应普及情报研究教育可以扩大选拔高素质情报分析人才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响应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要求,纷纷建立各类智库平台的背景下,情报分析人才短缺问题开始浮现。研究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的关联性,凸显文学批评课程增强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功能与情报分析能力培养的关联性,对于完善外语人才培养类型和解决智库分析人才不足的问题都会有较好的作用。三是在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中,客观上存在外国文化、外国价值观渗透等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学作品和以文学为基础的文化产品来实现的。因此,在专业外语和大学外语教学中关照外国文学批评的情报分析意义,增强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在研究中揭示外国文学作品及其衍生的文化产品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并通过合适渠道向更多的受众呈现相关研究成果,均会以文学作品的喜闻乐见特征和文学批评的思辨性及启迪性对巩固国家文化安全产生广泛的、独到的、实际的效果。况且,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广义上的情报分析能力理应被当作国民的核心能力来加以培养。四是借鉴情报研究的应用视角和关注点,对于外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改进和作用的延伸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文学批评与情报研究的关联性

冷战后,“情报机构不得不应对国际贩毒、生态污染、恐怖活动、非法技术转让、环境急剧变化和人口流动等问题,这些问题被情报专业人士和公众评论家们共认为情报工作的内容。在20世纪30-40年代达到鼎盛的仅限于服务作战、抓间谍和破坏者的情报工作经典时代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Wark 1991: 4)。可以看出,美国对于情报概念的认知从冷战后就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其涉及领域的延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其与文学批评关注面的重合。例如文学批评中的生态关注、对恐怖主义的叩问以及跨国主义问题探究等都与情报关注暗合。

文学批评何以与情报工作有如此多的关切重合?首先,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包罗万象,对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文学家以其对人类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写出的作品视角特别,认识独到,善于发现人类社会的微妙问题,揭示人类活动的深层动机,提炼人类生活的哲学意义。文学作品涉猎之广泛,为文学批评家施展各方面知识和才能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他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发现政治、商业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从一首诗

歌中找到一个民族认知世界的结构基础,可以写出《恐怖主义与现代文学》(*Terrorism and Modern Literature*, 2002)、《文学与国际关系》(*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等与情报界联系密切的专著。

其次,就战略层面来说,情报是“关于身边世界的知识或预知——是总统决策和遂行决策的前奏”(Johnson 2007: 1)。在这个意义上,情报所涉及的问题关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自然是普通百姓,更是文学家,所乐于关注的。Max L. Gross在美国国防情报学院的情报研究学院当过11年院长,他曾感慨道:“莎士比亚的兴趣点在很多方面与情报分析人员日思夜想的事件相重合:政变(《理查二世》)、政治暗杀(《裘力斯·凯撒》)、内战和国际战争(《亨利五世》《亨利四世》等)、政治独裁(《理查三世》)、政治/军事领袖的性格与领导方式(以上所有的作品都有所涉及)等。”(Gross 2003: v)

文学批评是对情报分析的一个重要补充。Gross在谈及阅读莎士比亚名著与情报分析的关系时说:“情报分析往往被界定为基于少量证据进行可信性预判的‘艺术’,而理解人性本质,特别是其在我们迥异的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对于弥补证据不足扮演着十分重要(a most important)的角色。”(ibid. vi)杰弗里·怀特是“顶级的军事情报分析家,他的专长是军事史”(ibid. v)。在他退休前夕,同行们期待他对情报分析工作做出高深莫测的经验总结,而他却捧出了《莎士比亚对于情报分析者的意义:文学与情报》这部研究专著。他认为情报分析界过多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忽略了人文研究。对此,他分析道:“这一缺失使我们丢掉了一个重要方面。……人文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有助于解决情报的难题。阅读和研究文学能够开阔想象力,而情报分析员需要想象力来进行推断、填补信息空缺,找到模式,换言之,获取发现。文学研究者要学会阐释(interpret)。这恰是‘发现意义(sense making)’的精髓所在。”(White 2003: 1-2)怀特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比作能够映射出政治和社会行为的镜子。如果持镜的角度正确,从中“可发现给我们带来启迪、非常有用的模式、比喻和意象”(ibid.: 2)。

3. 外国文学批评可以支持情报分析的几个方面

3.1 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情报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情报工作的理论,即 theory of intelligence。另一类是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理论,即 theory for intelligence。前者的目的是帮助学者深化对情报工作的理解、促进情报理论研

究,从而更好地向学生或公众解释情报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情报工作的规律特点。后者则是对情报工作者和情报使用者直接有用的理论。尽管在某些研究的环节,这两种类别的理论未必可以分得清晰,因为“从概念上来说,关于情报工作好的理论一定也是对情报工作有用的理论(A good theory of intelligence should, by definition, be useful for intelligence)”(Treverton et al 2006:4),但是这种分类法还是有助于消除对情报理论的某些模糊认识。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理论多半是其他专业的理论,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化学理论,可以被情报工作者“拿来”,用于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情报分析环节。美国情报研究界对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较为敏感,“拿来主义”相对盛行。

美国的情报分析理论与文学批评及相邻学科理论基本同源,这是因为理论的演进是以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广度深度演进为基本前提的。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现代——从1919到2000年的世界》里称,在1919年5月29日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被证实之前,对于宇宙认识的基础是牛顿的宇宙论,而这一理论又“是以欧几里德几何线条和伽利略的绝对时间观念为基础的。”(约翰逊 2001:1)而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扩展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界限之后,世界似乎进入了相对论的世界,相对主义始盛。到了20世纪末,保罗·约翰逊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人们认知模式的影响作用将让位于生物学的理论观点。就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而言,其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等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上述的主流理论演变模式:形式主义基本上以绝对观念为基础,幻想将文学批评变成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演进的过程中,显然相对主义渐占上风。情报分析方法的基础理论演进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从科学化的努力渐变为接受模糊理论。但是相对于文学批评方法,情报分析的方法似乎更多借用了由上述基本理论衍生出来的数学方法等。借助不同理论视角,情报界内外创造了大量的情报分析方法,或曰情报分析工具。数量之多,令情报分析人员应接不暇,以致于“一位军种情报分析军官说,束缚情报分析人员手脚的不是组织方式或是信息来源,而是繁多的分析工具”(Treverton & Gabbard 2008:xi)。其中一些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似乎也可以通过文学批评实践来检验或改善。实际上这方面实践已有所展开,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的文学研究已经颇具规模。文学批评学者还可以给情报分析工具清本溯源,利用自己对理论脉络的熟知,

对情报分析理论进行体系研究,改善对情报分析工具的认识和评估能力。同时也可通过对文学批评方法进行移植和改造,使其成为视角独特的情报分析方法。

3.2 从文学文本中挖掘和分析情报

在回答自己的设问:“情报分析人员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这一问题时,怀特写道:“莎士比亚与现代情报分析的相关性在于他在许多剧本中所谈到的问题。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和一部分悲剧中选取了一些英国史和欧洲古代史中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和人物作为其中心题材。”(White 2003:3)的确,严肃的文学作品无不对其时代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做出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有时可能是间接的。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富含人文关注,其揭示文化本质和人在一定文化中的行为模式细腻、具象、生动,富于情感进展逻辑刻画。文学作品对行为主体——人的解释,使其具备独特的情报价值:“了解‘他人’——无论是友方还是敌方——的挑战惟有在我们获知他们的思维方式之后才能得以化解。”(Bozeman 2002:5)杰克·斯纳德(Jack Snyder)在定义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决定战略群体使用武力与否的文化因素——的时候,将“一定条件下的情感反应”作为其中的重要要素(Snyder 1977:2)。这种情感反应的具体情形也许只能到这个战略群体的文学作品中去寻找。

其实,从文学作品中挖掘情报,题材仅是一个方面。在文学批评者看来,也许文学作品形式的艺术性,例如叙事中的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能反映更多更深刻的问题。笔者曾对日裔英籍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作品《团圆饭》(“A Family Supper”)做过分析(李建波 2009),指出生成其故事的结构与西方经典中的《奥德赛》和“最后的晚餐”同源。从表面内容来看,小说只是在讲述儿子从美国回到日本,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但是结合小说的深层结构,或可读出另外一种隐性叙事。这就是将小说中的父亲与奥德修斯和基督相关联的叙事。这位父亲曾经在二战中当过水兵,仍在自制塑料舰船怀念二战经历,仍在后悔当年当了水兵而没当战斗机飞行员,因为飞行员可以用飞机作最后的攻击武器。小说对美军占领日本后的一系列家庭不幸用似乎不经意的方式进行了叙述:一是母亲吃河豚中毒身亡。小说特别交待:日本在战败投降后盛行朋友相请吃河豚,其中似含有一定的自杀意蕴。二是父亲开的公司倒闭,原因是不适应美国强加的经营模式。三是父亲公司的合伙人在公司倒闭后剖腹自尽,同时打开煤气,杀死了自己的

两个女儿。这其中的隐性叙事所关联的是:奥德修斯家被求婚者占领祸害,奥德修斯返乡后谋求复仇。通过将家庭晚餐与“最后的晚餐”以题目和情节相勾连,则在隐性叙事层面将小说中父亲与基督相关联,从而制造为二战罪行喊冤叫屈的效果。从文学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研究角度来看,这种隐性叙事是母国意识形态借迁入国叙事模式得以呈现的一种类型。找出这种隐性叙事是情报价值的一种体现。当然,研究还可以延伸到对这种隐性叙事的接受问题中:如果石黑一雄在概念层面上为二战罪行喊冤叫屈,为日本军国主义复燃寻找借口,他将如何被英美读者接受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的隐性叙事利用的是西方叙事结构,带来的是这种结构的审美感受,西方读者对此并不设防,容易致西方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渐变其对于日本二战角色的评判。

3.3 用成熟的文学批评方法对非文学文本进行分析

唐岫敏和笔者合作的文章《文学文体研究与劝说话语意图分析》(2000)就文学文体研究对于话语意图的揭示作用进行过初步的探讨。我们认为:“一般而言,文学文体学研究的是文学欣赏与文本语言的关系,或者从文学欣赏出发到文本中寻找产生文学效果的语言特征,或者从语言分析入手研究一定的语言特征所能产生的文学欣赏意义。可见文学文体分析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探寻话语的潜在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探寻话语意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文体研究源远流长,具有较完备的框架和方法,借用来进行各种文体的劝说话语意图分析方便易行,也是有关学者自觉的选择。”(唐岫敏李建波:30)文中列举了较多实例,对语域、意象/隐喻、词义和句法与话语动机的有机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提到了 Charles Larson 曾列举的关于意象与话语意图关系的例子:希特勒在二战前的讲话中用两类意象指称犹太人,即“垃圾”和“害虫”。从后来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手段(集中营、毒气室)来看,这种意象的使用反映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真实意图。其情报意义在于:“如果欧洲的犹太人仔细地去听希特勒所用的词汇,他们本可以及时逃避六百万犹太人的命运——被当作垃圾和害虫灭绝。”(同上)

不仅文学文体学的方法,其他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常被用来进行与情报相关的文本分析。例如约翰斯顿在他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1995)中专列一节,说明其分析中国战略文化的方法,其中着重谈了两

种方法:一是 cognitive mapping (认知映射);二是 symbolic analysis (象征分析)。象征分析方法的文学批评渊源自可不赘述。所谓认知映射似属认知语言学范畴。且不说语言学的方法也是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约翰斯顿对认知映射是这样解释的:从文本中找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语句(如格言),用这些语句绘成思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地图,“从而把握‘文本自身的逻辑’,而非作者所采用的表层逻辑”(Johnston:50)。显而易见,这应该属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大量运用在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如《空军将领讯息中的文化主题:2005-2008》(*Cultural Themes in the Messages from Top Air Force Leaders, 2005-2008*, 2010)便是计算机软件与主题分析相结合的成果。

3.4 揭示文学批评成果中的情报意义

多年来,国外文学批评界涌现出不少紧跟时代脚步、应用价值较高的成果,其中也不乏具有情报价值的研究成果: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可以为情报分析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作品分析中对国民性、现代化进程伴随问题、后殖民问题、生态问题、女性问题、恐怖主义、伦理分析、文化病理分析等话题的探讨亦颇有真知灼见。我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也有结合我国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进行选题、研究的实践,这些实践虽然未逾文学批评界限,但其回应现实问题的动机强烈。查阅近年来相关期刊论文题目和高校研究生论文选题,就会发现大量研究针对现实问题,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例如有的学者结合莎士比亚作品经典化过程研究,分析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的选取标准问题;有的学者通过外国文学作品批评,梳理和分析外国现代化过程的伴随问题等。其深层目的都是研究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努力为我国的可持续现代化提供有用的资讯。(参见王守仁,林懿 2014;李建波 2013 等)

但是,在文学批评与应用领域之间似乎还存在断层;跨学科研究的匮乏和不够深入使得相邻学科学术研究界的相互借鉴都较为少见。文学批评包罗万象,若要使其成果发挥应有的价值,需要主动向其他领域渗透,需要补造衔接文学批评成果与其应用领域的被遗漏环节,开展文学批评成果应用价值分析评估和文学批评成果适用领域、应用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回到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的话题,亦即需要外国文学批评者分析评估并有效呈现文学批评成果中具有情报价值的理论方法和见解。

4. 结语

文学批评探究文本深层的意义,与情报分析在

理论、内容和方法上有所重合。文学作品富含人文关注,其揭示文化本质和人在一定文化中的行为模式细腻、具象、生动、富于情感进展和逻辑刻画。正如怀特所言,文学批评以其人文关注可以弥补情报分析的关注空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也可以成为情报分析理论方法的重要补充。

情报分析的目的是提供决策咨询,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实际上是外国文学批评能否提供或者帮助提供决策咨询的问题。对此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对于外国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关系的探讨是对外国文学批评应用价值一种体现方式的探究。文学批评的应用价值是无所不在的。即使20世纪“将文学的审美性从道德、宗教等关注中孤立出来”的努力也是作为“抵御商业化和非人性化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一些流派从政治关注中退了出来,专注于形式,但在这种退却中依然可以听得到政治的回响”(Habib:562)。的确,我们的许多文学批评实践都自觉不自觉地向着提高成果的应用价值努力,其中也不乏与情报分析暗合的成果。我们需要做的或许只是把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变为意识清晰的行动。另外,因为外国文学批评像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一样,具有视角的多样性:语言学也是其中一个视角,所以对于外国文学批评的情报意义的讨论也可推而广之:语言学等领域存在相应的研究空间。

当然,在讨论外语研究的应用价值的同时,仍需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尽管外国文学批评是一种实践活动,但也往往是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文学批评离开了基础理论,往往犹如微生物研究者离开了显微镜。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批评也在测算理论的适用度、评估其学术和应用价值,可能会因此对基础理论的完善,乃至对理论的创新,做出贡献。

注释:

① 其前身——国防情报学院的成果亦有此声明。

参考文献:

- 李建波. 2009. 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战略文化——以石黑一雄的《圆饭》为例[J]. 译林(4):194-196.
- 李建波. 2013. 信念与价值观危机:福斯特小说内外的英国“更年期”[J]. 外语研究(3):85-89.
- 沈固朝. 2009. 两种情报观: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 ——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思考[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1):22-30.
- 唐幽敏,李建波. 2000. 文学文体研究与劝说话语意图分析[J]. 外语研究(2):30-34.
- 王守仁,林懿. 2014.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

号——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J]. 外语研究(3):85-90.

- 王云峰,沈固朝. 2012. 美国 Intelligence 教育研究初探——以 IAFIE 为例[J]. 图书与情报. 2012(1):43-70.
- 约翰逊,保罗. 2001. 现代:1919 年到 2000 年的世界(上、下卷)[M]. 李建波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Bozeman, A. 2002.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to the Opening of the Modern Age*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hu, C., B. Dues & L. L. Miller. 2010. *Cultural Themes in the Messages from Top Air Force Leaders, 2005 -2008* [M]. Arlington: Rand Corporation.
- Gates, Jr., H. L. 1992. *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 [M]. New York and Oxford: OUP.
- Godson, R. 1986.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An introduction [C] // R. Godson.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for the 1980s: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3-9.
- Gross, M. L. 2003. Foreword[C] // J. White. *Shakespeare for Analysts: Literature and Intelligence*. Joint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10):v-vi.
- Habib, M. A. R. 2005.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Houen, A. 2002. *Terrorism and Modern Literature, from Joseph Conrad to Ciaran Carson* [M]. Oxford: OUP.
- Johnson, L. K. 2007. Introduction [C] // L. K. Johnson.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Johnston, A. I. 1995.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eeran, P. 2007. *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ories in the Art of Diplomacy* [M]. Hampshire & Burlington: Ashgate.
- Snyder, J. 1977.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M]. Arlington: Rand cooperation.
- Treverton, G. F. et al. ed. 2006. *Toward a Theory of Intelligence: Workshop Report* [M]. Arlington: Rand Corporation.
- Treverton, G. F. & C. B. Gabbard. 2008. *Assessing the Tradecraft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M]. Arlington: Rand corporation.
- Wark, W. K. 1991. Introduction: The fin de siècle phenomenon [C]. // A. S. Farson, D. Stafford & W. K. Wark.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1990s*.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3-9.
- Warner, M. 2007. Source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 // L. K. Johnson.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White, J. 2003. *Shakespeare for Analysts: Literature and Intelligence* [M]. Joint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10).
- Writz, J. J. 2007.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intelligence studies [C]. // Loch K. Johnson.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收稿日期:2015-03-18
- 作者简介:李建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杨淑华)